

# 收敛还是发散?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

刘夏明

魏英琪

李国平

(英国萨里大学管理学院) (兰开斯特大学管理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710061)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 1980—2001 年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 并对地区差距的形成渊源、未来发展战略的相关文献做了综述, 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表明, 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所下降, 但在 90 年代却呈上升趋势, 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 在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经济、地理、历史等多种因素使沿海地区处在了比较高的发展起点上, 地区发展战略、全球化、经济自由化, 要素市场的扭曲相互交织, 对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长期任务。中央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地区推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关键词:** 地区差距 经济发展 综述

### 一、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运行良好, 但经济增长在地区间却突出地表现出非一致性, 地区差距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它影响中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Wei, 1999; Demurger, 2001)。与政府对地区差距的关注相呼应, 国内外学者正进行一场关于中国地区差距的争论: 改革后中国的地区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造成地区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 但至今没有统一答案。

本文的目的在于: (1) 对中国地区差距是否扩大、地区差距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矫正地区差距的文献进行综述。(2) 利用最新的数据和新发展起来的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的分解方法 (Dagum, 1997a, b), 给出我们对于中国地区发展趋势的看法。(3) 提出我们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原因以及政府未来发展战略的一些观点。

本文第二部分对有关中国地区差距的主要理论进行评论性回顾; 第三部分对有关中国地区差距演变趋势的一些研究结论进行验证, 并提出我们对此的判断; 第四部分探讨地区差距的可能原因; 第五部分讨论未来的发展战略及政策; 最后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 二、中国地区差距的相关理论

有关地区差距的理论学说有许多种 (Armstrong and Taylor, 2000)。对于中国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被这些理论思想所引导, 它们分别是扩散效应理论 (trick-down approach), 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 (cumulative causation model) 和经济增长理论 (economic growth theory)。在这三种理论学说中, 前两种学说强调需求因素, 而后一种则强调经济的供给因素。

扩散效应理论认为, 资金首先应大量投放在经济体的一个特定地区, 一旦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之后, 它们对于其它地区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增加, 从而产生从该地区到其它地区的技术知识扩散, 最终, 其它地区会通过这种扩散效应或溢出效应而受益。一旦先进地区的生产成本上升到其它地区能有效与其竞争的时候, 地区差距将被矫正 (Golley, 2002)。扩散效应理论认为地区差距在短期内存在, 但在长期将消失。该理论支持优先发展特定地区的发展战略。

扩散效应理论的一个不足是地区间存在回波效应的可能, 即在优先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之后, 其它地区的资源还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该地区, 这正是累积因果模型的理论核心。该理论认识到了溢出效应和回波效应的同时存在, 但强调后一效应通常比前一种效应要大。一旦一个地区具有了竞争力, 由于集聚经济

(agglomeration economic) 和规模收益递增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的存在, 它会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没有投资吸引力的地区的经济将趋于停滞。该理论认为地区不平衡是可能的和持久的, 政府的政策能改变这种不平衡模式。比如, 可以通过在落后地区建立“增长中心”(growth center) 和吸引产业的产业区, 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等方法来取得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与以上两种需求导向模型不同, 经济增长理论已成为地区发展的一种主要理论范式。新古典增长模型(自1950年以来的基准模型)断言由于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 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地区经济增长将最终趋同。

现有的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收敛现象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所谓的 $\beta$ 收敛上, 这其中既包括绝对收敛, 又包括条件收敛。在所有经济体均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条件, 其差异仅在于初始收入水平不同的前提下条件下, 当比较贫穷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的经济体, 并最终都达到相同的稳态的时候, 这就是所谓的绝对收敛。然而, 一般来说, 不同经济体的基础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收敛的发生依赖于一系列反映经济体结构性差异的变量, 则这一收敛过程被称之为条件收敛。不同形式的收敛对应着不同的政策含义。绝对收敛意味着收入差异的自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 政策的制定者所要担心的, 仅仅是收敛速度缓慢的问题。而条件收敛是与区域结构性因素的差别密切相关的, 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力资本、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这就为政策制订者实施恰当的区域政策以改善贫穷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结构, 留有一定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 在于通过不变或递增的规模收益以及溢出效应所形成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内生累积。拥有上述资本比较多的地区的增长速度会快于所拥有的资本相对较少的地区, 于是形成了地区差距。然而, 如果在地区间有贸易和要素流动, 地区经济将会有收敛的可能。该理论已成为政府矫正地区差距政策的一个理论依据。

### 三、改革时期的中国地区差距

关于中国地区发展争论的首要问题是,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了? 各地区之间是

在收敛还是在发散? 以往的研究通常是用两种方法来研究此问题。第一种方法使用各种统计指标来做定性描述。第二种方法采用计量估计, 其优点是能区分影响地区差距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大小,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比较晚近的一些研究<sup>①</sup>可以看出, 有关中国地区差距演变趋势的结论是不统一的, 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以及地区差距测算指标的选取有关。常用的测算指标有: (a) 总产出值(GVO), (b) 物质产品(MP), (c) 国民可支配收入(NI), (d) 人均GDP, (e) 消费支出。究竟哪一个指标最优, 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a指标包括了中间投入, 在工业部门可能存在双重计算问题。d指标包含了服务, 是一个较好的指标, 但和a、b、c存在的问题一样, 它不能准确反映各地之间生活水准的不同(Kanbur and Zhang, 1999)。建立在家庭调查基础上的e指标是生活水准的一个近似反映, 但家庭调查的样本太少以至于它可能不能代表中国地区的整体状况, 另外, 该指标数据因跨越的年份太少而使动态分析难以实现。

造成研究结论不统一的第二个原因是不同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样本时期。由于地区差距随时间而变化, 样本时期的不同可能会造成结论的不同。

最后一个原因是不同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 最常见的是有权重或无权重的变异系数(CV)法、基尼系数法和GE(Generalized Entropy)指标分类法, 特别是Theil指标法。在许多研究中, 计算方法的详细过程并没有给出, 另外, 一些作者使用名义值而不是实际值, 或是使用整个国家的物价指数(price deflator)而不是地区指数来计算实际收入, 所有这些都可能会造成结论的混乱(Lu and Wang, 2002; Wan 2001; Wu 2002)。

经过比较, 较长一段时期的人均GDP看起来是验证地区间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的较好指标, 虽然它不是生活水准的最好指标。至于计算方法, 与差距研究相关的一个重要选择标准是它的可分解性, 即它能否在子样本内或子样本间进行分解。在上述的几种方法中, CV方法不能进行分解, Theil指标的分解仅考虑了子样本的不同而没有考虑子样本的分布状况(Dagum, 1997a, b), 基尼系数以往被认为不能分解, 除非子样本

① 见胡鞍钢(1995), 林毅夫等(1998), 万广华(1998), 张锐(1998), Chen J. & Fleisher B. M(1996), Fu & Li(1996), Jian et al.(1996), Tsui(1996), Hu(1997), Tsui(1998), Kanbur & Zhang(1999), Yang(1999), Lin(2000), Zheng et al.(2000), Demurger(2001), Fujita & Hu(2001), Wei et al.(2001), Zhang(2001), Brun et al.(2002), Cai et al.(2002), Demurger et al.(2002), Shan(2002), Wu(2002), Bhalla et al.(2003)。

的超变密度(intensity of transvariation)为已知。直到1997年, Dagum 提出了一种新方法, 基尼系数的分解问题才得以解决, 具体分解方法如下:

基尼系数的定义为:

$$G_t = \frac{1}{2N^2} \sum_{j=1}^k \sum_{h=1}^k \sum_{i=1}^{n_j} \sum_{r=1}^{n_h} |y_{j\bar{i}} - y_{hr}| \quad (1)$$

其中  $y_{j\bar{i}}$  ( $y_{hr}$ ) 是时间  $t$  时在  $j$  ( $h$ ) 区域内的经济体(省份)  $j$  ( $h$ ) ( $j, h = 1, \dots, N$ ) 的人均实际 GDP,  $N$  是经济体的总数 (= 29),  $k$  是样本区域的个数 (= 2),  $n_j$  ( $n_h$ ) 是  $j$  ( $h$ ) 区域内经济体的个数,  $y_t = \frac{1}{N} \sum_{j=1}^k \sum_{i=1}^{n_j} y_{j\bar{i}}$ , 基尼系数在 0 和 1 之间, 数字越大说明差距越大。

使用 Dagum (1997a) 的方法, 可以把地区差距分解为三部分:  $j$  区域内差距的贡献 ( $G_{wt}$ ), 区域间超变净值(net of transvariation) 差距的贡献 ( $G_{nt}$ ), 和超变密度的贡献 ( $G_{it}$ )。

$j$  区域内的基尼系数为:

$$G_{j\bar{i}} = \frac{1}{2n_j^2} \sum_{i=1}^{n_j} \sum_{r=1}^{n_j} |y_{j\bar{i}} - y_{j\bar{r}}| \quad (2)$$

区域内差距的贡献为:

$$G_{wt} = \sum_{j=1}^k G_{j\bar{i}} p_j s_j \quad (3)$$

其中  $p_j = \frac{n_j}{N}$ ,  $s_j = \frac{y_{j\bar{i}}}{N y_t}$ 。  $G_{wt}$  可以理解为是区域内基尼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j$  和  $h$  区域间的基尼系数为:

$$G_{j\bar{h}} = \frac{1}{2n_j n_h (y_{j\bar{i}} + y_{h\bar{r}})} \sum_{i=1}^{n_j} \sum_{r=1}^{n_h} |y_{j\bar{i}} - y_{h\bar{r}}| \quad (4)$$

$j$  和  $h$  区域间差距的贡献和  $j$  和  $h$  区域间超变密度的贡献分别为:

$$G_{nt} = \sum_{j=2}^k \sum_{h=1}^{j-1} G_{j\bar{h}} (p_j s_{jt} + p_h s_{ht}) D_{j\bar{h}} \quad (5)$$

$$G_{it} = \sum_{j=2}^k \sum_{h=1}^{j-1} G_{j\bar{h}} (p_j s_{jt} + p_h s_{ht}) (1 - D_{j\bar{h}}) \quad (6)$$

其中  $D_{j\bar{h}}$  为  $j$  和  $h$  区域间的相关经济富裕度(relative economic affluence),  $y_{j\bar{i}} > y_{h\bar{r}}$ 。

从数学角度看, 即,  $D_{j\bar{h}} = \frac{d_{j\bar{h}} - p_{j\bar{h}}}{d_{j\bar{h}} + p_{j\bar{h}}}$ , 其中  $d_{j\bar{h}} = \int_0^\infty d$

$$F_j(y) \int_0^\infty (y - x) dF_h(x), p_{j\bar{h}} = \int_0^\infty dF_h(y) \int_0^\infty (y - x) dF_j(x)。$$

$$G_t = G_{wt} + G_{nt} + G_{it} \quad (7)$$

我们根据以上方法估计和分解了 1980—2001 年间中国 29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基尼系数和 Theil 指标。遵照文献中的惯例, 我们把整个国家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sup>①</sup> 尽管地区差距的总体趋势在两种方法下的结果相近, 但其分解结果却并不一致。由于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不但避免了 Theil 指标分解中碰到的问题, 并且提供了一些有关超变(transvariation)对地区差距作用的相关信息, 因而本文只报告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

表 1 给出了各省以 1990 年为基年的人均 GDP, 从中可看出,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其广泛的基础。样本期间各省人均 GDP 增长率的平均值高于 6%。除云南、新疆、内蒙、陕西和宁夏外, 中国各省在 1991—2001 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 1980—1990 之间的增速。从地理上看, 并非所有的沿海省份比内陆省份增长的速度快。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指标列在表 2 中。从表 2 可看出, 省际间收入差距在 1980—90 年间表现为轻微下降后, 自 1990 年以来, 呈稳步快速上升趋势。这与以往的几个研究结果相一致。<sup>②</sup> 如果把省际间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收敛, 很明显, 在整个样本期间, 29 省(直辖市、自治区)并没有总体收敛的趋势。

在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内部, 虽然 2001 年的数值低于 1980 年, 各省之间的地区差距仍表现为 1994 年之前的轻微下降, 及此后的持续上升。因此, 在中国也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相比之下, 沿海各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内陆各省。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总体上表现出了上升趋势, 虽然在 1980—1983 和 1988—1990 年间, 其略有下降。

基尼系数的分解表明, 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内部差距对中国地区的总体差距的贡献在 1994 年前表现出下降趋势, 1995 年后表现为上升趋势。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对于总体差距的贡献在 1995 年前表现为上升, 而在 1996 年后表现为下降。表 2 也表明地区间超变(transvariation)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很小, 所占比例只在 0.9% 到 5.6% 之间, 且表现为 1995 年前的下降

① 本文的沿海地区包括广东、江苏、上海、福建、海南、山东、辽宁、天津、浙江、河北、北京和广西等 1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其它省份为内陆地区。

② 见 Tsui (1996), Zheng et al. (2000), Demurger (2001), Zhang (2001), Cai et al. (2002), Demurger et al. (2002), Wu (2002)。

趋势和 1996 年之后的轻微上升趋势, 这表明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穷人更富有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小, 换句话说,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虽然 1990 年前沿海内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大, 但在

这之后, 与沿海和内陆地区内部的差距相比, 整个国家的总体差距已成为了最大的差距。表 2 还表明中国地区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

表 1 1980—2001 人均 GDP (以 1990 年价格为不变价格)

	人均 GDP (RMB)					年增长率 (%)	
	1980	1985	1990	1995	2001	1980—1990	1991—2001
<b>中部</b>							
安徽	527	967	1182	2129	3585	8.1	10.1
湖北	737	1242	1556	2634	4619	7.5	9.9
黑龙江	1156	1558	2028	2839	4598	5.6	7.4
河南	516	833	1091	1896	3182	7.5	9.7
湖南	666	967	1288	1986	3344	6.6	8.7
吉林	773	1236	1746	2793	4692	8.1	9.0
江西	566	862	1134	2021	3394	7.0	10.0
内蒙古	614	1023	1478	2210	3710	8.8	8.4
山西	756	1231	1528	2268	3830	7.0	8.4
<b>西部</b>							
甘肃	547	758	1099	1591	2541	7.0	7.6
贵州	380	637	810	1158	1734	7.6	6.9
宁夏	700	1078	1393	1879	2906	6.9	6.7
青海	938	1325	1558	2090	3342	5.1	6.9
陕西	548	874	1241	1782	2933	8.2	7.8
四川	573	891	1134	1864	3132	6.8	9.2
新疆	739	1262	1799	2761	4358	8.9	8.0
云南	524	851	1224	1848	2808	8.5	7.5
<b>东部</b>							
北京	2463	3553	4878	8210	14038	6.8	9.6
福建	707	1207	1763	3927	6957	9.1	12.5
广东	899	1482	2537	5557	8669	10.4	11.2
广西	640	868	1066	2005	3037	5.1	9.5
海南	622	1107	1589	3342	4739	9.4	9.9
河北	721	1087	1465	2763	4878	7.1	10.9
江苏	801	1420	2103	4394	7896	9.6	12.0
辽宁	1375	2017	2698	4260	6810	6.7	8.4
山东	797	1323	1815	3770	6318	8.2	11.3
上海	3264	4743	5910	10721	19763	5.9	11.0
天津	2076	3015	3621	6063	10194	5.6	9.4
浙江	820	1550	2122	4929	7880	9.5	11.9
均值 (标准差)						7.5 (1.4)	9.3 (1.6)

注: 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01、2002》。我们以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指数来构造地区 GDP 的平减指数(GDP deflator), 然后以此平减指数和人均 GDP 的名义值计算出人均实际 GDP。其中, 由于缺少西藏的数据, 本研究不包括西藏。另外, 由于重庆是在 1996 年才从四川分离出来, 我们把重庆的数据加在了四川之中。

表2 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1980—2001)

年份	总量	地区内部		地区间 内陆—沿海	贡献率(%)		
		内陆	沿海		地区内	内陆—沿海	transvariation
1980	0.2883	0.1410	0.3219	0.3444	38.74	55.64	5.62
1981	0.2813	0.1372	0.3089	0.3385	38.27	57.24	4.49
1982	0.2714	0.1432	0.2941	0.3247	38.81	56.49	4.70
1983	0.2700	0.1356	0.2991	0.3236	38.71	56.32	4.97
1984	0.2713	0.1333	0.2992	0.3269	38.36	56.68	4.96
1985	0.2698	0.1262	0.2958	0.3285	37.65	58.07	4.27
1986	0.2692	0.1261	0.2935	0.3285	37.52	58.13	4.35
1987	0.2700	0.1259	0.2855	0.3331	36.76	59.25	3.99
1988	0.2720	0.1243	0.2828	0.3385	36.14	59.71	4.15
1989	0.2688	0.1200	0.2798	0.3358	35.90	60.14	3.96
1990	0.2683	0.1217	0.2774	0.3352	35.91	60.26	3.83
1991	0.2767	0.1262	0.2684	0.3514	34.60	62.59	2.81
1992	0.2820	0.1209	0.2527	0.3692	32.29	65.86	1.85
1993	0.2882	0.1139	0.2403	0.3880	30.10	68.60	1.30
1994	0.2963	0.1121	0.2386	0.4033	29.10	69.90	1.00
1995	0.3039	0.1147	0.2447	0.4127	29.14	69.96	0.90
1996	0.3074	0.1164	0.2488	0.4164	29.29	69.72	0.99
1997	0.3118	0.1196	0.2527	0.4211	29.44	69.47	1.09
1998	0.3158	0.1211	0.2539	0.4268	29.31	69.63	1.06
1999	0.3173	0.1231	0.2569	0.4273	29.56	69.31	1.13
2000	0.3193	0.1243	0.2610	0.4284	29.80	68.99	1.21
2001	0.3192	0.1250	0.2642	0.4266	30.11	68.63	1.26

注: 同表1。

总之, 我们的分解研究表明: (1) 沿海各省之间的收入差距小于内陆各省。(2) 地区之间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 不存在俱乐部收敛。此外,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中国地区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 但自90年代之后, 呈上升趋势。当然, 我们的发现是建立在以人均GDP来近似反映地区收入的基础之上。

正如上文所述, 对中国地区发展的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在收敛框架内集中讨论收入差距。大多数研究通过使用不同的方法(截面数据, 时序数据或面板数据), 发现了条件收敛的存在, 否认了绝对收敛的可能, 尽管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控制变量以消除稳态的不同。这

意味着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技术和其它因素的差异, 它们不可能收敛到相同的稳态。绝对收敛的不存在表明地区差距在中国仍旧存在。条件收敛中有关控制变量的研究为研究地区差距的形成原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这将在下一部分加以讨论。

#### 四、形成地区差距的可能原因

地区差距的形成原因是关于中国地区发展争论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在文献中, 许多因素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 比如, 政府政策, 宏观经济因素, 相异的资源禀赋, 要素流动性的不足以及全球化。当然, 以上所列只是部分观点, 并没有穷尽所有研究。值

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因素并非绝对外生,它们之间存在相关性,这使得探求地区差距根本原因的工作变得很困难。

### 1. 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

中国政府的地区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常常被认为是形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以下就中国政府发展战略的演变分析却表明,它们在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发展战略和政策可能只是形成地区差距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政策经历了很多变化。在1949—1972年之间,为了服务于国家安全,中国采取的是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落后的内陆地区,特别是三线地区。在1973—1978年间,中国的发展战略转向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刘玉和刘毅,2002)。紧接着,在改革开放之后,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开始,政府强调地区发展战略应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沿海地区应着力于优化产业结构,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以梯度发展,即扩散效应理论为基础,内陆地区则应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产业以支持沿海地区(陈淮,2001),在总体上,强调经济应从沿海到内陆梯度发展。“六五”和“七五”时期,5个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经济发展带和上海浦东开发区在沿海地区相继建成,政府鼓励沿海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吸引FDI,以扶持沿海地区高科技产业和外向型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财政金融、国企改革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走在了内陆地区的前列。

在八五(1991—1995)和九五(1996—2000)期间,地区发展战略开始转向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地区差距的降低上(陈淮,2001),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以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增加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人员培训的投资,为外资向内陆地区的流入和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合作提供便利。1999年9月中央提出了西部开发战略,想通过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向西部,并借此使西部赶上其它地区。但由于各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平衡或协调发展战略的作用一直没有表现出来。

在经验研究上, Demurger et al (2002) 通过使用一种代表政府优惠政策的指标研究了政策变量对于人均GDP增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变量系数的大小比较稳定,但是t检验值在三个样本期间(1979—1984, 1985—1991, 1992—1998)却呈单调递增趋势。据此他们认为优惠政策是通过FDI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但

这种政策并不是FDI集中在沿海地区,从而促进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Zhang, 2001; Fujita and Hu, 2001)。根据Zhang(2001)的研究,FDI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固有的比较优势,政府政策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沿海地区的这种优势得以实现。另外,沿海地区落后省份所占的相当比例的FDI促进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也促进了沿海地区内部和整个国家经济的收敛而不是发散。

在我们看来,地区发展战略最多只能算是地区差距的一个必要条件。如表1所列,尽管沿海发展战略给了沿海地区一些优惠政策,一些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慢于内陆的一些省份。另外,1994年之后,沿海地区内部各省之间的差距还在增加(见表2)。因此,各地区经济固有的一些特征,而不是地区发展战略在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 Demurger et al (2002)所使用的代表政策的变量和其他研究所使用的区分内陆和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或许不仅仅体现了政策因素,还包含了没有被估计到的其他因素。

### 2. 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

与第一个因素(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紧密相关的是全球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不管是全球化还是经济自由化,都促进了经济增长。正如Fujita and Hu(2001)所总结的那样,全球化,特别是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通过乘数效应,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和竞争作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出口和FDI,作为外部需求和资本流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技术和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全球化带给中国的竞争压力也促使中国企业提高其生产力,从总体上看,国际竞争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经济的自由化要求取消价格控制、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壁垒,发展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分权化,缩小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降低国企比重,发展非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都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利用和竞争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正经历着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经济自由化使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各地根据自身优势发展地区经济,因此促进了经济增长。许多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已显著地影响了经济增长(Lin, 2000; Sun and Parikh, 2001; Wei et al, 2001; Brun et al, 2002; Zhang and Zhang, 2003)。

然而,如果各地并非融为一体,它们参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程度及自身发展水平不同,则全球化和自由化可能会扩大地区差距。贸易和FDI份额大的地区的经济增速会快于份额小的地区。经济结构多样化

和地方财政基础好的地区在为地方经济提供融资时拥有更多的余地。而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由于其活动能力 (social capacity) 差, 抑制了知识扩散, 资源流动和投资 (Jia, 1998), 或许不能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中获益。

已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以上观点。Poncet (2003) 指出 1987—1997 年间随着中国各省国际贸易参与程度的增加, 国内贸易在不断减少。贸易和 FDI 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比如 1992—1998 年, 86% 的贸易和 87% 的 FDI 是在沿海地区 (Zhang and Zhang, 2003)。即使在沿海地区内部, 贸易和 FDI 的分布也是非平衡的。在同样的样本期内, 广东一个省就占有贸易总量的 45% 和 FDI 的 30%, 而广西和河北仅仅拥有其中的 1% 和 2% (Zhang and Zhang, 2003)。因此, 一些沿海省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要比其它省份强得多。

沿海地区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快于内陆地区。集体企业, 特别是乡镇企业,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沿海地区发展的更快 (Lu and Wang, 2002)。由于其在人力资本、财力、基础设施、科技基础和生产效率上的优势, 沿海各省的活动能力强于内陆各省 (Jia, 1998)。

### 3. 要素市场的扭曲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 如果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可自由流动, 地区间的要素收益率就会趋同, 优先发展特定地区的发展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对地区差距就只会产生有限的作用。中国没有有效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Jia, 1998), 要素的流动受到限制 (Xu, 2002)。虽然政府出台了有利于要素市场信息披露和要素流动的政策, 制约要素流动的条件依然存在, 这包括对国有企业直接间接地支持, 对地方企业雇佣外地劳工的限制, 劳动力流动的明文限制, 对地方居民在医疗、保险、教育等社保福利上的优惠待遇 (Cai et al, 2002; Yang, 2002)。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沿海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由农业转移至乡镇企业, 而内陆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则缺少这样的机会。另外一个特征是劳动力市场的零散化, 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Cai et al (2002) 指出中国劳动力流动的 84% 发生在地区内, 他们的计量分析也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是形成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 文献中常常所忽视的一点是劳动力的非同质性。对于技术性的劳动力而言, 跨省跨地区的流动相对比较容易, 他们趋向于在沿海地区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然而劳动力的这种流动对于地区差距的影响作用则是模棱两可。一方面, 从内陆到沿海的技术性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家乡汇款, 从而促进了内陆地区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 技术人才的流出会抑制家乡

生产力的提高, 从而可能拉大地区差距。

中国地区间的投资是不平衡的。资金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地区内部 (Wei, 2000)。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开放到 90 年代早期, 中国采取了财政投资分权化的政策, 旨在提高资金分配和管理的效率, 该政策虽然扩大了地方政府积累资本以谋求发展的自主权, 但却降低了中央政府分配资金的能力, 这产生的一个后果便是沿海和内陆在投资上的差异。增长速度快的一些沿海省份的固定投资增长较快, 并且较少受国家预算或国有银行资助, 而一些增长速度慢的内陆省份则完全依赖于中央为其发展提供资金。在资金的去向上, 沿海地区的大部分投资被回报率高的非国有企业所吸收, 而在内陆地区, 大部分资金却被人员富裕, 管理不善, 技术陈旧, 效率低下的国企所占用。

### 4. 地区特定因素

地区特定因素指一个地区特有的自然、历史、基础设施等发展条件, Demurger (2001) 和 Demurger et al (2002) 认为地理位置、交通运输、通讯设备能解释省际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相当一部分。根据陈栋生 (2001) 的研究, 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形成于第一个五个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 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的基础建设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并不一致, 使这些产业没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 西部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因素比较少, 人们的思维方式陈旧。除此之外, 环境保护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与此相反的是由于历史遗留的商品意识和冒险精神, 集体经济雄厚的财力基础, 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 所有这些都使东部地区更能吸引外部投资, 创造更多的乡村非农就业机会。

### 5. 累积性因果循环

一些研究认为中国一些省份持久地落后于其它地区的原因是累积性因果循环。Golley (2002) 指出一个地区的发展依赖于该地区的产业发展, 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快于其他地区, 则可能形成集聚经济, 并导致地区差距的持久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地区差距似乎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东南沿海的 5 省 (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 显然是改革期间累积性因果循环的受益者。Fujita and Hu (2001) 也发现由于地理上的比较优势, 大多数制造业部门倾向于集聚在一个地区, 即使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也是这样。

Wei (2000) 指出地区间和产业间固定投资的不均是形成中国地区非平衡发展的一个显著原因。但投资的这种不平衡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呢? Wei 认为地区投资既非累积性因果循环过程也非收敛过程, 这种投资的非平衡是由于东部能 (1) 在分权化进程中, 保留了

比较多的利润和折旧金;(2)从发展比较快的非国有部门得到大量资金;(3)借助于优惠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纳了大部分FDI;(4)由盈利能力强的非国有部门吸纳了大部分投资。不难发现,Wei的解释实际上与累积性因果过程所做的解释相一致。由于较好的经济条件和优惠政策,“沿海各省能积累更多的资本,取得更高的投资回报”(Wei, 2000)。

由此可见,地区差距由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所造成。经济地理、历史等多种因素使沿海地区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在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科技水平、生活水平上强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处在更高的改革起点上,而要素省际间的流动壁垒以及要素市场的低效又制约了内陆地区赶超沿海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奉行的梯度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实现和发展,通过FDI的大量流入,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催化,沿海地区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出现了低失业和高财政收入景象。沿海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更多地参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而在改革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以及全国总体差距的拉大。

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不断拉大的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上海和其他沿海省份所出现的新一轮投资和增长浪潮。1992年后,人力资本、国内外资金大量涌入沿海地区。能源供应得以放松,进口原料、如铁的价格变得相对低廉,内陆地区作为沿海生产原材料供应基地的地位被降低。环境保护虽然对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但在短期却不利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些及其他一些因素,使20世纪90年代后的地区差距不断拉大(陈淮2001)。

即使中央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不采用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而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开放、经济自由化政策,全球化、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在地区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在相同的优惠政策下,由于沿海地区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和较强的吸收高新技术的能力,大多数外国投资还会选择沿海地区。在这个意义上,累积性因果循环假说仍然可能成为现实,由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投资和产业首先集中于沿海地区,从而使省际间人均收入差距扩大。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的作用可能只是加速了该进程。

梯度推移理论和累积因果假说都认识到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溢出效应的存在。然而,对这种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的结论却不一致。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发现产出增长的溢出效应存在于从东部到中西

部,以及从中部到西部。然而, Brun et al (2002)则仅证实了从东部到中部的溢出效应,并未发现从中部到西部的溢出效应。Jia (1998)的研究表明1987—1994年间从东部到中西部的溢出效应很有限。Yao and Zhang (2001)指出,扩散效应是可能的,但内陆地区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赶上沿海地区。

## 五、未来的发展战略

争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未来的发展战略,正如文中第二部分所述,累积性因果模型和新增长模型,为政府采用改善基础设施,吸引产业到落后地区,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等旨在降低地区差距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些政策措施与学者们所提出的主张相一致。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定期地向外界公布它的发展战略。作为“局内人”,国内学者似乎比海外学者能提出更详细更有效的政策建议。虽然学者们提出的战略或政策多数相互补充,但也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下文将综述文献中所提到的一些主要观点并给出我们对未来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看法。

如前文所述,为了消除地区差距。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包括鼓励西部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和保护自然环境,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旅游,提高科技、教育、文化和公众健康水平。

在“十五”期间,中央政府的地区发展战略是使西部的发展政策落在实处,加速中西部的的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分布,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西部地区,中央政府希望其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和教育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西部应面向海外和国内其它地区两个市场,推进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使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中部地区,中央将提高其产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对于东部地区的定位是,它应站在系统创新、科技创新的前列,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与出口部门。此外,中央政府还采用城市化发展战略,以刺激农村和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

以上所述的发展战略是指导性的,它们是不是可行?应采取什么样的相应政策以保证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文献中提到了以下政策:全球化、经济自由化;资源在地区间的有效配置利用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些政策的大多数来自对地区差距形成原因的个别研究,它们与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却不谋而合。

### 1. 内陆地区的全球化与经济自由化



该政策的依据是经济改革和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有助于经济增长(Wei et al, 2001)。Fujiita and Hu(2001)指出中央政府应通过在内地地区增加基础建设投资以改善这些地区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应出台一些吸引FDI和私人资本从沿海流入内地的优惠政策,内地地区的经济自由化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Demurger(2001)也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以及经济增长扩散效应的发挥。Demurger et al(2002)进一步指出所谓的优惠政策实质上是取消管制的政策,以使地方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央应该把这种放松管制的政策扩展到内陆地区。Yao and Zhang(2001a, b)也同意西部需要更广泛的开放,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投资以赶上东部的政策建议。陈栋生(2001)强调了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性,并呼吁中西部地区进行所有权的结构性调整。这包括鼓励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从国外和沿海地区流入内陆地区,在内地地区的国企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些政策建议或多或少地与中央政策相一致,这说明这些学者赞同中央政府发展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以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他们为政府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与其他学者不同,陈栋生(2001)给出了中西部地区所有权结构调整的具体步骤。

## 2 东、西部协调发展

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紧密相关的是,一些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垂青于所谓的东西协调发展战略。以地区比较优势的分析为基础,Wang(2000)指出东西部经济是互补的,东部不仅应该向世界市场开放,也要把自身发展与西部联系起来。东部应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上,而把传统产业转移给西部,在转移过程中,东部应帮助西部对这些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西部应着力于改善其投资环境以吸引东部和国外的资本与技术,只有当两个地区共同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才能提高。在这种协调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努力提高西部的市场化、科技、教育水平,加快基础设施、贸易中心和增长中心的建设,以支持东部和西部的协调发展。Demurger et al(2002)也强调在内地地区改善科技、教育、公众健康对于平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一种有效的西部发展战略必须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的形成。

国内学者所讨论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不仅与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相一致,而且给出了实现协调发展的具体步骤,这无疑有利于决策者的决策。

协调发展战略需要政府的财力支持,Tian(1999)认

为中央政府应通过市场导向的改革来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胡乃武(吴江,2000)认为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中央的财力有限,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西部开发银行。胡乃武建议发行建设彩票和地方政府债券,成立风险投资基金以促进发展。Yao and Zhang(2001a, b)认为中央政策在指导东部资源流向西部,减少资本劳动地区间的流动壁垒,建设完善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资源的再分配或许会有损于东部未来的经济增长。

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对于平衡发展是必要的。但Golley(2002)认为地区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自我矫正过程,目前集聚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最终必将转向其它地区。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土地成本在逐渐上升,环境也在恶化,加工业所需原料的获取已变得困难起来。最终,即使没有政府积极的干预政策,当企业为降低成本而转向其它地区时,地区差距的趋势会自动逆转。

一方面,东部在改革期间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中部将来会怎么样呢?虽然中央政府在“十五”规划中提出了加快中部发展的构想,Liu(2003)仍担心中部地区可能会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被忽略。如果继续推行东西产业置换(industry exchanges)战略,那么中部的资源就会被东西部所吸纳,其结果是中部可能会成为空壳。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Liu(2003)建议中部地区应采纳“反扩散”策略,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和服务业,并着力传统农业和工业的技术升级。许多人认为武汉、郑州、长沙、合肥、南昌正在成为中部的增长极。其中,武汉的光学纤维技术,长沙的新材料和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已是技术领先部门。Liu认为这些增长极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中部地区,也有利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 3 劳动力的流动与城市化

Cai et al(2002)指出应通过废除户口制度,降低地方保护和城乡社保差距,来取消劳动力市场发展中的障碍,Lu(2002)也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中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城乡之间的差距,Chang(2002)认为加快城市化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解决需要现代城市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这样,地区差距才能逐渐被消除。

这些政策建议再次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吻合。“十五”规划中,中央政府认识到提高城市化水平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决定改

革户籍制度,消除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的各种限制,但同时强调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间以及地区间转移的有序性。

以上评论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反映了文献研究中的一些建议,文献中的许多政策建议是政府文件的一种完善,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海内外学者似乎相互联系,共同致力于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应用。

区域协调发展不可能很容易地实现。一些学者对前景并不乐观。Yao and Zhang(2001a, b)认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是如何同时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区差距的缩小,不管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地区差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是个严重的问题。Renard(2002)也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缩小持悲观态度,WTO促使中国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但这种益处在全国并不平均,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在这种利益分配的竞争中是输家,农村城镇差距将进一步恶化。另外,在未来几年中,国有企业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它会给中国带来大量的失业。考虑到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改革的整体果实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被该地区所享受,国企改革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拉大地区收入差距。

我们认为缩小地区差距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地区差距是由历史、地理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所造成,其中地理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几乎不可被矫正。缩小地区差距很重要,但追求绝对的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平衡地发展起来的。中国政府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寻求地区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均衡发展。

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把以前的发展战略归结为效率和公平的替换战略(trade-off)。比如,改革前的发展战略是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而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则以牺牲公平换取效率(冯宗宪、陈永华,1997;刘玉、刘毅,2002)。但如果以比较优势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两种目标事实上并不矛盾,中央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为东中西的分工与合作给出了总的指导,但由于这种战略概括性太强,以至于不能反映各地的比较优势。每一个地区应以其资源禀赋为依据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中央战略来评价这些地方性的发展战略,

基于以上分析,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改革开放政策推进到每一个地区。如果中国的每一个地区都能享受到相同程度的开放和自由化政策,如果生产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壁垒被消除,那么中西部的经济

增长就会赶上来。国企改革造成的下岗失业在短期不能避免,从长期看这一部分失业人员将被私营、外资等非国有企业所消化吸收。中央政府必需制定出详细的战略步骤以推动改革的深化和效率的提高。中央政府还必须提出相应的产业发展规划,以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中央政府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帮助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資源重新配置。为了改善内陆地区的投资环境,中央政府必须利用有限的财力来支持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鼓励地方政府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虽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和环境的恶化将迫使沿海地区的企业将其生产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地区差距最终将自然消失,但中央政府的产业重规划划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加速地区差距趋势的扭转进程。

## 六、结 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测算并解释中国的地区差距,然而,以往的研究就采用何种方法来测算地区差距的问题还未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对此形成一致的结论了。本文以人均GDP作为地区收入的近似指标,并用总的基尼系数指标测算了中国的地区差距,结果证实了一些研究的发现:中国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90年代之后却一直在上升。我们也发现中国地区总体差距主要来自内陆和沿海之间的差距,在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是经济、历史、地理等各种因素使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站在更高的改革起点上,地区发展战略、政府政策、全球化、经济自由化、地区特定因素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对地区差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长期任务。中央政府的地区协调发展战略为经济活动在东西部的分工与合作提供了总的指导,但它的概括性、综合性太强,以至于不能反映个别地区的比较优势。每个地区都应以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中央政府可根据中央总体战略对此加以评价。中央政府必须(1)允许各地拥有相同程度的开放和经济自由化,以使中西部能赶上东部。(2)制定详尽的战略步骤,取消生产要素的流动壁垒,以促进改革的深化和效率的提高。(3)提出产业发展规划,以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4)帮助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鼓励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資源重新配置。

## 参考文献

- 陈栋生, 2001:《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管理出版社。
- 陈淮, 2001:《中国西部开发政策的战略转变》,《北京青年报》2月7日。
- 冯宗宪、陈永华, 1997:《区际利益冲突与调适》,《人文杂志》第4期。
- 胡鞍钢, 1995:《中国地区差距报告》,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林毅夫、蔡  、李周, 1998:《中国经济转型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 刘玉、刘毅, 2002:《区域政策的矛盾内涵解析》,《中国软科学》第8期。
- 万广华, 1998:《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
- 吴江, 2000:《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讨会概述》,《经济学动态》第11期。
- 张锐, 1998:《收入差距: 费解的经济难题》,《经济研究》第8期。
- Armstrong H. and Taylor J. 2000, *Regional Economics and Policy*, Blackwell.
- Bhalla Ajit, Yao Shujie and Zhang Zongyi, 2003,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Econ. Transition* 11(1), 25—39.
- Brun J. F., Combes J.L. and Renard M. F., 2002, “Are there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coastal and noncoastal regions in China?” *China Econ. Rev.*, 13, 161—169.
- Cai F., Wang D. and Du Y., 2002, “Regional dispa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impact of labour market distortions”, *China Econ. Rev.*, 13, 197—212.
- Chen J. and Fleisher B.M., 1996,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Comp. Econ.*, 22, 141—164.
- Dagum Camilo, 1997a,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 *Empirical Econ.*, 22(4), 515—531.
- Dagum Camilo, 1997b, “Decom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Gini and the generalized entropy inequality measur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tatistics Section, 157<sup>th</sup> Meeting*, 200—205.
- Demurger S., 2001,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 Comp. Econ.*, 29, 95—117.
- Demurger S., Saches J. D., Woo W. T., Bao Shuming, and Chang G. H., 2002,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loc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nd having the right incentives”, *China Econ. Rev.*, 13, 444—465.
- Fu F. and Li C., 1996, “Disparities in mainland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local economic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31(11), 1—30.
- Fujita M. and Hu D., 2001,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1985—1994: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nals of Reg. Science*, 35(1), 3—38.
- Golley J., 2002, “Regional patter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Econ. Transition*, 10(3), 761—801.
- Hu D., 1997,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y, mimeo”, CCER, Peking University.
- Jia L., 1998, “Regional catching up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reform period”, *International J. Social Econ.*, 25(7/8), 1116—1177.
- Jian T., Sachs J. and Wamer A., 1996,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 Rev.* 7(1) 1—21.
- Kanbur Ravi and Zhang Xiaobo, 1999, “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 to 1995”, *J. Comp. Econ.* 27(4), 686—701.
- Lin S., 2000,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 Inquiry* 38(3), 515—526.
- Liu Maosong,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and policy analysis for central areas”, *China Econ. Times*, 12 Feb.
- Lu D., 2002, “Rural-urban income disparity: impact of growth, allocative efficiency and local growth welfare”, *China Econ. Rev.* 13, 419—429.
- Lu M. and Wang E., 2002,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changing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post-reform China”, *Growth and Change* 33(1), 42—71.
- Poncet S., 2003,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China Econ. Rev.* 14, 1—21.
- Quah, D., 1993, “Galton’s fallacy and tests of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5, no. 4, pp. 427—443.
- Renard, Mary-Francoise, 2002, “A pessimistic view on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 *China Econ. Rev.* 13, 341—344.
- Shan J., 2002, “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income disparity in China”, *Int. Econ. J.* 16(2), 47—63.
- Sun H. and Parikh A., 2001, “Export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Reg. Studies* 35(3), 187—196.
- Tian X., 1999, “Market orient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in China”, *Post-Communist Economics* 11(2) 161—172.
- Tsui K. Y., 1996, “Economic reform and interprovincial inequalities in China”, *J. Develop. Econ.* 50, 353—368.
- Tsui K. Y., 1998,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Chinese rural inequality: new methodology, empirical find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Comp. Econ.* 26, 502—28.
- Wan G., 2001, “Change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decomposing the Gini index by income sources”, *The Australian J.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 45(3), 316—381.
- Wang Nengying, 2000, “Western—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East- West Interaction”,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Forum 12, 12-14.

Wei Y. D., 1999,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3(1), 49-59.

Wei Y. D., 2000,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Mao China”, Geojournal 51(3), 169-179.

Wei Y., Liu X., Song S. and Romilly P., 2001, “Endogenous Innovation Growth Theory and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China”, J. of Int. Develop. 13(2), 153-168.

Wu Yanrui, 2002,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An alternative view”, Int. J. of Social Econ. 29(7/8), 575-598.

Xu X., 2002, “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s become integrated under reform?”, China Econ. Rev. 13, 116-133.

Yang D. T., 1999,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m. Econ. Rev. 89(2), 306-10.

Yang D. T., 2002, “What has cause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 Rev. 13, 331-334.

Yao Shujie and Zhang Zongyi, 2001a, “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diverging clubs: A cas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J. Comp. Econ. 29(3), 466-484.

Yao S. and Zhang Z., 2001b,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reforms”, J. Develop. Studies 38(2), 167-186

Zhang Q. and Felmingham B., 2002, “The role of FDI, exports and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J. Develop. Studies 38(4), 157-178.

Zhang W., 2001, “Rethinking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Econ. Planning 2001, 34(1-2), 113-138.

Zhang X. and Zhang K.H., 2003, “How does globalisation affect regional inequality with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China”, J. Develop. Studies 39(4), 47-67.

Zheng Fei, Xu LiDa, Tang Bingyong, 2000, “Forecasting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European J. Operational Research 124, 243-254.

##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 —Debate o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Liu Xiam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urrey)

Wei Yingqi

(Management School, Lancaster University)

Li Guo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y over the period 1980-2001, reviews the debate on its causes, discusses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draws relevant conclusions for policymakers. Our overall Gini (and Theil) index confirms that overall regional disparities declined in the 1980s but increased in the 1990s. The gap between the inland and coast regions was the dominant contributor to the overall regional inequality. There was no club convergence within the inland and coast regions. Economic,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s put the coast in a better position than the inland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and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each other and have played some role in regional disparities. It will be a long-term task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egional dispari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eeds to implement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individual provi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n the national basis.

**Key Words:** Regional Dispa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JEL Classification:** O180, R580, R110

(责任编辑: 晓喻) (校对: 子璇)